

道德何为?

——说《三国演义》开篇词

李子广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 明代状元杨慎的《临江仙》词,原是其历史词话中“说秦汉”的开篇词。毛氏父子笔削《三国》而把它作为小说开篇,其意义内涵发生变化,而与《三国演义》的悲剧性主题发生联系。这首词是毛氏修订《三国》的传神点睛之笔。它既关乎小说的境界主旨,又体现出修订者的才调文心。

[关键词] 杨慎;毛氏父子;尊刘贬曹;悲怆

[中图分类号] I207.4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623(2004)03-0051-0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临江仙》词是明代状元杨慎的作品。它原是杨慎编纂的《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以下简称《词话》)中“说秦汉”的开篇词。清毛纶、毛宗岗父子将它置于《三国演义》卷首,作为小说的开篇,这首词便更加广泛地流传开来。

毛氏父子修订的《三国演义》(以下简称毛本《三国演义》),作为后来最流行的本子和最后定本,在《三国演义》一书的演化上十分重要;而作为毛本《三国》的这首开篇词,其作用和意义也同样十分重大。

《三国演义》现存最早的刊本是明嘉靖壬午年(1522)刊刻本,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嘉靖本《三国》)。毛本《三国》主要就是在这个本子的基础上修改、增删而成的,在思想和艺术方面较嘉靖本《三国》都有较大提高。这首《临江仙》词被毛氏父子看中,移入小说篇首,是服从于毛本《三国》的整体的思想与艺术需要的。这实际上就必然会牵涉到这样一些问题:杨慎的《临江仙》词的本来内涵是什么?

毛氏父子为什么要把它移入《三国》?这首词被移入《三国》后,其内涵有无变化?作为毛本《三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首词是提高了还是损害了小说的思想与艺术?等等。只有较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读懂这首词,也才能真正读懂《三国》。

一、状元杨慎及其《临江仙》词

明代状元杨慎因触怒皇帝,半生放逐。他不甘心为“天地之蠹”^{[1](P103)}而埋头著述,耽于艺文。其《词话》即为讲唱文学名作。这篇作品,实际上寄寓着他经历坎坷平生后,对历史与人生的感悟、洞悉。

杨慎是一个状元。他出身官宦之家,科第家声,盛极一时。他家从祖父起,四代出了六个进士一个状元。这位状元,即为杨慎。家乡新都人常以“相如赋、太白诗、东坡文、升庵科第”^{[1](P9)}并称。杨慎父亲杨廷和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擅长诗文词曲,母亲黄氏亦有较高文化修养。生于官宦书香之家的杨慎,从小便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少年杨慎在诗文创作上即崭露头角,曾受到当时文坛大家王廷相、李东阳的称赏。杨慎于正德六年(1511)状元及第。其殿试状元策受到读卷官李东阳、刘忠、杨一清的称赞,评为“海涵地负,大放厥词”^{[1](P34)}。授修撰,供

[收稿日期] 2004-04-06

[作者简介] 李子广(1962-),男,内蒙古赤峰市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职翰林,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杨慎还是一位直臣。他初涉官场任职翰院时期,针对武宗荒嬉无度,上《丁丑封事》直谏,言辞激烈。但武宗未纳,游淫如故。他愤而称病还乡,以为抗争。世宗朝,杨慎参与《武宗实录》的纂修,能对史事秉笔直书,有良史之才,时人称之。

杨慎一生的关键,尤在议礼一事。武宗朱厚照去世,因无子嗣,弟朱厚熜以小宗外藩亲王入继帝位,是为世宗。朱厚熜继位后,就其生父兴献王的封号及祭祀典礼问题,与群臣商议,是为“议大礼”。以礼部尚书毛澄与大学士杨廷和为代表的群臣的主张,与世宗意见相左,君臣之间冲突激烈。杨慎父杨廷和因此致仕。后杨慎与群臣跪伏左顺门为议礼事哭喊请愿,触怒世宗,被发往云南永昌卫戍边,至死不赦。

杨慎又是个逐客。因议礼获罪,杨慎贬放云南永昌,长达三十多年,直至老死。乃至他七十岁归蜀,遭小人构陷,仍被押解回滇。这位逐客的孤魂,最终无法返乡。

杨慎的一生无疑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但穷愁著书,也成就了他为有明一代著名学者兼文学大家的地位。他的《词话》,不同于周兴嗣《千字》、李翰《蒙求》,及王令《十七史蒙求》等书,而“一变旧体,仿宋元市井演史、调笑转踏之例,成书二卷,叙事则论文与词文互用,首尾则引词与散场俱备,故称‘词话’。其言不满三万,铺扬历代兴亡之迹,自洪荒迄于元世,概为十章,独具史法”^{[21](P386)}。其实,杨慎的这篇作品,不独为读史启蒙,而兼寓身世感慨,一唱三叹,注入了更多的文人情味。宋翔凤《杨用修史略词话叙》云:“(杨慎《词话》)至于重复悲慨,凄其断绝,令人一而叹,再而悔。如雍门之哦,一座人皆泣;如越石之啸,羌胡皆涕泗沾衣,投戈北去,而不自知其哀痛之何从也。是真所谓情生于骚,而用广于骚者欤!”^{[21](P273-274)}这段话非常生动准确地揭示了杨慎《词话》的情感意蕴。“情生于骚”一语,可谓解味之言。

杨慎《词话》中第三段“说秦汉”的开篇词《临江仙》是其中最好的一首,也最能代表《词话》的整体情感基调。这首词的内容主要写历史的苍凉无情及其悲感。江水滔滔,大浪淘沙,英雄已矣,往事成空。这一悲感时时浮现于《词话》中,“重复悲慨,凄其断绝”:

天上乌飞兔走,人间古往今来。沉吟屈指数英才,多少是非成败。富贵歌楼舞榭,凄凉废

冢荒台。万般回首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

检尽残篇断简,细评千古英雄。功名富贵笑谈中,回首一场春梦。昨日香车宝马,今朝禾黍秋风。谁强谁弱总成空,傀儡棚中搬弄。

在怀古伤今、感慨兴衰中,尤集中于歌咏功名富贵的不可依凭。这其中自然注入了词人的身世不幸,因而感慨颇深。杨慎时时在《词话》中提醒人们:“高人满座垂清听,始信书生用意深。”“冰弦唤醒红尘梦,不比寻常劝世文”。所以,他要寻求知味人:“沙金璞玉求良匠,流水高山待赏音”“知音肯共闲谈笑,典故何妨细讲论。”所谓“用意深”、“不比寻常”,其实就是杨慎所感悟的历史:是非成败转头空。参透了历史,也就参透了人生。杨慎从自己的人生出发看历史,看出了沧桑;又由历史回看人生,看到了空无。情生于骚,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词话,借历史写忠爱功名的落空,他的《词话》也就具有了“不比寻常劝世文”的深沉缠绵的悲剧意味。

词的下片,写历史兴亡,是非成败尽入渔樵闲话,看似旷达,实则冷漠无情。当时的轰轰烈烈、悲悲喜喜,没想到随着逝水东流,成为历史。而所谓历史,不过变为渔者樵夫下酒的闲话。那么,这种旷达的背后,也就深隐着“是非成败转头空”的虚无的沉痛,而其表现方式是寄沉痛于悠闲。也就是说,杨慎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超然,他所表现出的是文人一贯的自怜身世感慨兴亡而故作达人的腔调声口。

二、毛氏父子与《三国》

毛纶、毛宗岗父子对嘉靖本《三国》所做的虽是局部细节的改订,但他们却是从《三国》整体出发,有着通盘考虑的。或者说,按照自己的观念修订、评改《三国》,就形成了独特的《三国》毛氏版。

较之嘉靖本《三国》,毛本《三国》在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上更加鲜明、突出。嘉靖本《三国》虽然承继了三国故事中尊刘贬曹思想,并以之贯穿全书,但在艺术处理上并不彻底。这集中体现在对曹操这一人物的塑造上。曹操一出场,嘉靖本《三国》写道:“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而毛本《三国》则云:“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把前者所有的赞语尽数删掉。两本虽都写到汝南许劭对曹操“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价,但在作为重要的人物出场描写上已显出很大不同。这些不同是贯穿全书的。嘉靖本《三国》不但写了曹

操讨伐董卓,统一北方的英雄的一面,而且还对其英雄胸襟有所赞赏。在叙述关羽离开曹操,挂印封金、不忘故主的故事中,作者特意插入《三国志》裴注,赞曹操有王霸之度,“斯实曹公之休美”。尤可注意者,嘉靖本《三国》写了曹操在征战中不忘关注百姓,为民称颂的一面。征张绣时,他号令森严,“凡官军过麦田,并皆下马,以手扶麦相递传送而过”,而不准破坏麦田,百姓“望尘遮道而拜,称颂圣德”。征袁绍时,曹操亦有严令,并宣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若废民业,终得空城,有何用哉?”此外,书中许多地方还借别人之口或诗词论赞,写出了曹操的“德业”。对于这些,毛本《三国》则进行了大量删改。

嘉靖本《三国》在尊刘贬曹的主体思想倾向中,时时杂有对曹操的赞颂笔墨,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存在,其原因无疑是十分复杂的。三国历史与三国故事,在史家、文人和民间那里往往有不同的叙述与评价。史家的尊魏尊蜀,本有不同,大都取决于现实需要。文人创作和民间口承故事,则更多以理想、道德观念来构建心中的活的历史,是主观创造的历史。一般而言,历史演义作家对前人史料和相关的文学素材的汲取、改造、加工、提升,既有依赖,又能去取,甚而有时另起炉灶,才可能最终成就一部小说杰作。罗贯中思想蕴含又是多样复杂的。他在“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陈述百年,该括万事”^{[41](P277)},创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时,所采取的尊刘贬曹这一思想主线是很明显的,且多所个人创作提升。但在作为体现这一思想倾向的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却不无瑕疵。譬如既写他的奸雄,却又颂其仁德,就有些不通。有的论者认为这体现了罗贯中的以“仁德”评判人物的思想,无论你是正统或非正统,只要有仁德就加以肯定,并从而表现出作者的一定程度的民本思想。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如果作为历史人物评价,从现代史学观点而言,当然应该如此,但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就是要遵从文学本身的逻辑,而展示人物形象本身的复杂性。那么,嘉靖本《三国》在塑造曹操时,就理应写出曹操“奸雄”与“仁德”的心理动因和性格逻辑,才真实、合理、可信。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介绍曹操家世时,说曹是“汉相曹参二十四代孙”,祖父曹节“仁慈宽厚”,父曹嵩“忠孝纯雅”,可接着则写他“自幼便奸”,其后来所为多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行径。如此为人,书中却又写了他的仁德爱民之举,并加以赞颂,等等。书中写到曹操死后,以极其赞美之词作“盖棺论定”：“雄哉魏太祖,天下扫

狼烟。动静皆存智,高低差用贤。长驱百万众,亲注十三篇。豪杰同时起,谁人敢赠鞭?”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削平海内。”或转录《三国志·武帝纪》中语评价曹操:“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唯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从这些评价看,曹操几乎是一个“完人”。这却又与全书主旨发生悖谬。简单地说,曹操的“好”与“坏”该如何统一?这对人物塑造十分重要,是判定人物写得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嘉靖本《三国》在这些方面的处理是矛盾的、生硬的,因而写曹操的“好”,有附加拼贴之嫌,而难以给人以艺术的真实感。这恐怕与罗贯中的思想矛盾有关,也与他多把史学评价注入艺术评价中,而不能很好地用完整、丰富的形象本身说话相关。再者,《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为章回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由于对史实与史评的依赖,而造成一定的艺术缺失,也是原因之一。

毛本《三国》对罗贯中的上述缺失进行了修正,在文字上做了大量删改,突出了尊刘贬曹的思想主线。毛氏《读三国志法》云:“读《三国志》(指《三国演义》)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陈寿之志,未及辨此,余故折中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毛氏明确地揭出了评改《三国》以蜀汉为正统的用意。于是大事修正:修饰字句、增损情事;除伪去诬,去粗取精。我们认为,这些做法总体上提高了《三国》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品位,从而使毛本《三国》成为最通行的本子。由此看来毛氏不仅做足了曹操的“白脸文章”,而于罗贯中之《三国》亦称功臣。关于这些,似可从毛本《三国》开篇词透视一二。

三、毛本《三国》中的《临江仙》词

毛本《三国》开篇之《临江仙》词,是毛氏修订《三国》的传神点睛之笔。它既关乎全书的境界主旨,又体现出修订者的才调文心。具体地说,这首词因与毛氏正统论及书中尊刘贬曹思想相贯通,而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作用。

毛本《三国》提出正统说,推崇刘备,贬低曹操、孙权和司马氏,是以“理”、“大义”、“正”为根据的。

所谓理、大义、正,意思相近。毛氏《读三国志法》认为,“刘氏未亡,魏未混一,魏固不得为正统”,因而刘备、诸葛亮讨曹伐魏,就是“大义昭然揭于千古”,这也就是“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的基本理由。此外,毛氏还强调创业之“正”：“高帝以除暴秦、击楚杀义帝者而兴,光武以诛王莽而克复旧物,昭烈以讨曹操而存汉祀于西川。祖宗之创之者正,而子孙之继之者亦正,不得但以光武之混一为正统,而谓昭烈之偏安非正统也。”^{[51](P4)}这里的“正”除正统之意外,还包含着与“暴”“不义”相反的意思,高帝除暴秦、光武诛王莽,都是起于义的。这样,毛氏的正统论就与道德论相贯通了。不但如此,其正统观的“论地不若论理”,即以偏安之刘备为正统,多少有些诛求历史之心的道德论意味,而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强者逻辑。然而强者毕竟为侯,而其理又有何用?

毛氏自言“折中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而朱熹《通鉴纲目》之作,“其最先动机,乃为不满《通鉴》之正统问题”^{[71](P1682)}。《朱子语类》卷105载:“问纲目主义,曰:主在正统。问:何以主在正统?曰:三国当以蜀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朱子不满司马光《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而有《通鉴纲目》之作。毛氏承继朱子此意,而修订《三国》,其用意有些许相同处。

毛纶、毛宗岗父子都是穷愁潦倒的文士,他们遣闷无方,笔削传奇、小说,也是不无托意的。这种托意借正统说笔削《三国》而得以实现。除对《三国》作大量删改外,其评定小说中的人物也是爱憎分明的。如对曹操与刘备的评价,就极力强调曹操之奸与刘备之仁。评曹操杀吕伯奢时宣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时云:“曹操从前竟似一个好人,到此忽然说出奸雄心事,此二语是开宗明义第一章。”评刘备携民渡江云:“……即走矣,若非不忍于百姓,则犹可以轻于走,捷于走,脱然而走。其走而及于难者,乃玄德之过于仁,而非孔明之疏于计也。”

删削、评点小说,如同“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一样,成为中国几大小说名著的存在形态。评点家的主观理念、情感意识注入小说,往往改变或修正小说的主旨、艺术,于是经过评点的小说实际上已成为作者与评点家的共同创作。如金圣叹之于《水浒》,脂砚斋之于《红楼》。毛氏父子笔削《三国》,“折中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论地不若论理”,尊刘备、贬曹操,表现了他们对三国这段历史的

独特思考。然而,作为仁德之君的刘备的失败,无疑具有深重的历史悲剧色彩。“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的历史理性彻底幻灭了。杨慎的《临江仙》词被毛氏选中,置于小说开篇,就具有了特殊的历史反思的悲剧意味。

如果说杨慎的词作在他的《词话》中所表现的是自怜身世、感慨兴亡的文人腔调,具有一种空泛的悲感的话,那么,毛氏父子笔削《三国》而托意其中,移入小说中的这首词就已和小说的境界主旨密不可分,而具有了更为具体的悲剧主题,亦即注入了与《三国》文本精神内涵颇为一致的对历史的悲怆的哲学沉思。这一沉思就是:道德对历史有无作用?

词的上片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开头,将江水与英雄并举,除杨慎原来表现的一般的逝水英雄的主旨之外,它在这里已更多指向了三国故事本身。小说三国故事与长江的关系太密切了,不要说作为重头戏的赤壁之战,三国会战于长江,就是其他大大小小的战事有不少亦与长江相关。因而,当我们吟味这两句诗时,必然会联想到小说中与之相关的英雄故事。这种诗化的沉思,来源于历代诗人词客对三国历史故事的创作吟咏。如:

江上战余陵是谷,渡头春在草连云。
分明胜败无寻处,空听渔歌到夕曛。

——唐 崔涂《赤壁怀古》

人亡建业空城在,花落西江春水平。

——唐 韩偓《吴郡怀古》

一旦狂风江上起,花随风散落谁家。

——唐 周昙《吴后主》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宋 苏轼《赤壁怀古》

隆中鱼水三分业,江上风云八阵腾。

——宋 陆游《诸葛书台》

乾坤何事老英雄?滚滚长江自东去。

——元 周权《赤壁泛舟》

叹西风卷尽豪华,往事大江东去。彻如今
话说渔樵,算也是英雄了处。

——元 冯子振《(正宫)鹦鹉曲 赤壁怀古》

这些诗句都给人以历史兴衰、往事成空之感。然而作为《三国》开篇词,由于大江与具体英雄人物的联系,尤其与赤壁之战等壮观场景的联系,就使得词的头两句大气不凡。接着的“是非成败转头空”一句,与其说是慨叹刘备、曹操、孙权、司马氏等小说人物的历史是非成败该作何评价,毋宁说是一种悲怆的

发问:是“论地不若论理”?还是“成者王侯败者贼”?

若按着儒家道德论历史观,“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或“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于是,历史的是非成败似乎有了标准:仁者必胜。然而事实上却是“仁者未必成功,成功者未必仁。仁者之心,以仁仁天下,不仁者之心,以仁济其私。故善论人者,论其心之如何,而成败不与”^{[41](P148)}。毛本《三国》即属“善论人者”的论心之作,因此,它越是强化尊刘贬曹思想,就越是增强了作为正统者与仁者的刘备失败的悲剧意味。如朱熹所歌咏的那样,“天意竟莫回,王图不偏昌”,“尚赖偏方传正统,离离芳草伴斜曛”,“俯仰空城诗客恨,啼鸟满树不堪闻”。由此看来,“是非成败转头空”一句,所歌咏的是仁德者无为的历史悲怆。词的其他部分,看似超旷,实则从“空”字生发,更多的是“分明胜败无寻处,空听渔歌到夕曛”、“彻如今话说渔樵,算也是英雄了处”的无奈与迷惘。这种无奈和迷惘不是凿空的,而是根植于《三国》本身的整体悲剧氛围的。

中国历史的叙事本来就有“史笔诗心”的特性。钱钟书《管锥编》论《左传》时以为,史家叙事,有如《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谓“隐”、“余味曲包”、“情在词外”者;二者施用不同,波澜莫二。他发现《左传》记言,“公言私语,盖无不有”,“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驰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6](P164,165)}这些实为史笔而具诗心之体现。进而,钱氏言:“明、清评点章回小说者,动以盲左、腐迂笔法相许,学士晒之。晒之诚是也,因其欲增稗史

声价而攀援正史也。然其颇悟正史稗史之意匠经营,同贯共规,混町畦而通骑驿,则亦何可厚非哉。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6](P166)}毛氏修订、评点《三国》,也可以此种“史笔诗心”来加以评定。他为突出尊刘贬曹思想主线,笔削《三国》时,也是“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的。《临江仙》一词,即是毛氏在对《三国》揣摩体悟、总体把握的前提下,为全书立基定调,叩问和反思历史的一曲悲歌。这曲悲歌,不仅给小说中的正统论注入了深重的苦涩与迷茫,造成了思想的深刻,使其具有了叩问历史、俯视历史的大气与崇高,而且也形成了贯通全书的精神主脉,提高了小说的艺术品位。

[参 考 文 献]

- [1] 丰家骅. 杨慎评传 [M].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2] 王文才. 杨慎词曲集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 [3] 罗贯中. 三国志通俗演义(影印嘉靖本)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
- [4] 朱一玄, 刘毓忱. 三国演义资料汇编 [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3.
- [5] 陈曦仲, 宋祥瑞, 鲁玉川辑校. 三国演义会评本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 [6] 钱钟书. 管锥编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 [7] 钱穆. 朱子新学案 [M]. 成都:巴蜀书社, 1986.

PROBE INTO THE INTRODUCTORY POEM IN SAN GUO YAN YI

LI Ziguang

(Liberal Arts College,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uhhot, Inner Mongolia, China 010022)

Abstract The poem *Lin Jiang Xian*, written by Yang Shen, Numbr One Scholar in the Ming Dynasty, originally was the introductory poem in *Shuo Qing Han*, a historical novel with parts in verse. Mao Lun and Mao Zonggang, father and son, used it as the introductory poem when they revised *San Guo*. Since changes of its connotation took place, it got in touch with the tragic theme of *San Guo Yan Yi*. The poem was a vivid touch and also an apt word when Mao Lun and Mao Zonggang revised *San Guo*. The poem not on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ist of the story but also embodies the revisers' literary and artistic talent.

Key words Yang Shen, Mao Lun and Mao Zonggang, father and son; respect Liu Bei and demote Cao Cao; grief

[责任编辑 张九玲]